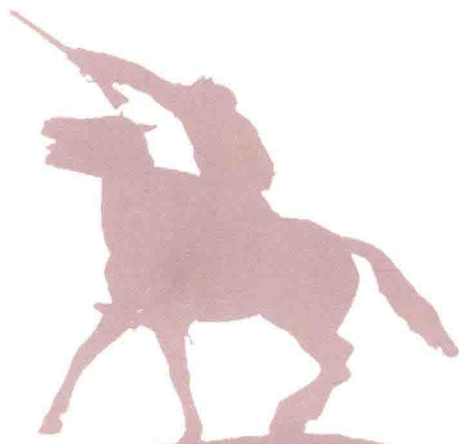


范卫东 著

抗戰時期中國散文的
自由精神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自由精神研究

范卫东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自由精神研究/范卫东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651-2211-8

I. ①抗… II. ①范… III. ①散文—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144 号



-
- | | |
|------|---|
| 书 名 | 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自由精神研究 |
| 著 者 | 范卫东 |
| 责任编辑 | 向 磊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
| 电 话 |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
| 网 址 | http://www.njnu.com |
| 电子信箱 | nspzbb@163.com |
| 照 排 |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
| 印 刷 | 兴化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 开 本 |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9.75 |
| 字 数 | 250 千 |
| 版 次 |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51-2211-8 |
| 定 价 | 45.00 元 |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序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诞生的现代中国散文,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小改变传统中国散文体式结构,却最大程度拓展了古典散文内在精神的文体形式。现代小说不仅突破了旧小说的章回体,而且由文坛边缘走向中心;现代诗歌的新,除了完全挣脱旧格律和程式韵脚的束缚外,新诗人们形神并致“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①开一代诗风;而现代话剧完全是一种“舶来品”,全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唯有现代散文起步就表现出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同时又并非与传统的决绝。朱自清曾经这样生动描绘 20 世纪 20 年代的散文创作“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②而鲁迅先生更明确认为,五四“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

① 郭沫若、宗白华、田寿昌:《三叶集》,上海:亚东书局 1920 年版,第 49 页。

② 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文学周报》1928 年 7 月 31 日,第 345 期。

③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76 页。

体样式的变化随着一个时代演进有所调整和变革,本是无可厚非的。五四开启的现代中国散文作为独立文体现象之存在,其重要的缘由不是以反传统表现出的现代性,而是最大限度地代表了文学本质的人学精神,即个性自由之精神、灵活多样之体式。同时,又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时代精神相契合。郁达夫作为新文学的第一代资深作家,最先切实地感受到“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的强”^①。因此,现代中国散文不只是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何其芳、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一批散文大家能够写定的。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散文史。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积极编撰,是继中国现代小说史编写之后,在内容上最为充实的分类史。如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1987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范培松著《中国现代散文史》(199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张振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散文史》(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等等。同时,现代中国散文的研究成果不仅有一流散文家的专论著作问世,而且对现代大批著名作家的散文创作的挖掘和探究也愈加深入。更可喜的是现代散文的理论批评、艺术、风格、体式等文体特性学理研究的成果大量涌现,如范培松的20世纪散文研究系列《中国现代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黄科安的《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李标晶的《20世纪中国散文诗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李一鸣的《中国现代游记散文整体性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出版)等。显然,百年来,无论

^①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5页。

现代中国散文创作的起步和整体状况,还是新时期以来逐渐深入推进的现代中国散文研究的总体水准,都形成了对后来现代散文研究者的巨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范卫东博士“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自由精神”研究课题的选择,是有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的。

放在我面前的这部《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自由精神研究》书稿,就选题而言,就有给人有眼睛一亮的感觉。一是,现代中国散文完整的断代考量,尤其抗战时期散文独立研究的成果基本阙如;二是,单一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散文自由精神特性的成果尚丰,可是较为系统地以“自由精神”立论的专题不多;三是,选择“自由精神”将时代特征、创作主体、文体形态三者有机串联和整合,研究视角新颖而有创见。当然,这部书稿更有作者自己的独立追求。

通读书稿,完整而有深度的还原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面貌和其精神内涵,作者的努力最突出之处,是打破了传统史的阶段性的描述,甚至也不是一谈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大板块的模式。而是紧紧扣住抗战时期散文创作的 actual 状况,由作家作品入手,认真发现和思考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赋予一个创作文体背后的特殊问题,即现代散文作家如何以生命的书写,完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建构和自我表达的方式。书稿正是通过大量抗战时期散文作家的创作文本的剖析,透视不同创作主体的不同思想取向,从而使一个宽泛而复杂散文创作现象,有了清晰的归理,并且给人有启发性的认知。诸如,“日常生活的品味生命”“文化批判的身姿”“人生的理性光彩”等等论述,不只是对一种类型散文作家的归理,更是在探寻散文创作中多元而丰富的精神路向。显然,在抗战文学史的叙述和其散文创作整体面貌的凸显上,作者尝试着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表达和思考。这是其一。其二,书稿作者并不回避抗

战时期文坛的多变,散文创作者的零乱之事实。相反,以“身份的认同”找到了在作家和创作之间内在精神文化联系的纽带。无论是茅盾、沈从文、老舍、冰心、胡风、苏雪林、钱钟书等创作多样的作家,还是王了一、田仲济、储安平、袁昌英、楼适夷、廖沫沙等创作单一的作家,都面对“抗战”,认同“国家”、“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散文创作的主题。同时,在民族的炼狱中,散文作家身上强烈的主体意识又极大地激发了传统文化的反思和重建。书稿的可贵之处,是对许多过去现代散文史着墨不多的作家作品有较为深入细致的解析。除了挖掘他们身上民族抗战爱国主题的意向,更多试图通过文本解读来揭示其创作中承载生命和美学的特殊功效。比如评析王了一的抗战散文“不像梁实秋那样‘超然’、‘洒脱’,也不像钱钟书那样‘旁观’、‘猎奇’,而是往往流露出深沉的悲愤”。他“以深沉宁静代替躁动喧闹,正视历史的劫难与民族的痛苦,在对不平的愤慨中仍保持着理智和温厚的姿态”。为此,该书稿“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整体展现突破了战争政治思维惯性的作家作品定位。抗战散文重新阐释的巨大空间,正是由作者开阔的阅读视野,才发掘和提炼出其中包孕着丰富能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资源。其三,书稿再值得肯定的是,“自由精神”的中心问题,不但在“抗战”和“散文”两者之间找到了契合的文化逻辑支点,更重要的还在于借助“抗战”和“散文”两个平台,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文化的内在思想诉求获得了一次整体性的反思。由人的解放的文学革命到左翼运动的革命文学一路演进发展的现代中国文学,尚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人的文学”的真正精神所在,抗战便爆发了。正是国家危难的逼迫,最大限度激发了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和捍卫,民族独立的诉求。抗战文艺率先负载了呼唤民众“自由”、“独立”精神的使命。诚如作者言,“抗日战争激发的民族精神投射在作家的创作、思想活动和生活形态中,从现实政治、文化

观念、文学表象等不同层面最初体现的是国民身份意识的强化,同时也使在战争延续过程中思考自我与民族、生存与意义的自由精神逐渐显豁”。大量的抗战散文创作以最迅疾最灵活的方式凸显了民众的思想的“自觉”,尤其,深化了对个体自由和群体自由之关系的现实认知,五四新文学新文化的民主自由精神得到了推进。

这部书稿范卫东博士是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修改和充实情况下完成的。现在读来,尽管最初在讨论选题和写作目标时我并不看好论题能够有多大飞跃,但是卫东博士以自己的努力交上了一份令人刮目相看的“答卷”。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以后,受到同行匿名评审专家和答辩评审组专家的一致好评。抗战文学一般被认为思想主题比较单一,特别是散文创作凌乱而松散,缺少大作家,能够与小说及其他文类比肩的影响之作不多。而实际上,抗战文学无论在史料挖掘还是就历史重读均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这正是抗战文学的散文研究面临的两重矛盾。卫东博士也恰恰是在选题诱惑和面对其困境之难度上,做出了上述几个方面积极而有效的努力,提升了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研究的水准。客观上看,卫东博士的研究并没有按照我原有的设想,首先应该在抗战文学的史料上有所开拓,其次才是问题思考的深入。可是,他的聪明和睿智,并将其极高的情商消融到抗战散文的细读中,以饱满的生命热情和纤细的性灵感应,提炼出抗战散文中长期被遮蔽的一些精神资源,并在五四以来中国历史长河经历着抗战血与火的狂风恶浪的考验中,感受和体味“自由精神”的分量和具有的特殊新质。卫东博士选择内容严肃而沉重,形式灵活随意的“抗战散文”为研究对象,也是十分切合他的为人处事的。他是性情中人,对人重情重义,做事情严谨踏实、满腔热忱。之所以能够从抗战散文中读出“自由精神”大话题的个人一得之见,既是他沉潜于历史的沉

思,又是他真诚的情性的生命体验。我们虽然可以苛求作者课题的研究在抗战相关史料上还有进一步开掘的巨大空间,但是 you 不得不承认这一倾注个人情感的文本重读和文学史的反思中有给后人的学术启迪。卫东博士并没有宏论抗战散文的伟大,却用真情拥抱自己的研究对象,感同身受抗战散文作家生命描摹人与事的背后所呈现的坚强而深邃的学术理性。

我是这一研究课题的第一个读者,当初就有这样一种感觉,即对一个学术课题投入情性之深,研究与个性相融合,卫东博士是做得最好的。现在再读书稿,这种强烈的感受依然。所以,卫东博士在书稿付梓之际嘱咐我写几句话,作为导师觉得此意不好推脱。原因有二,一是学生虽然已经毕业了,但是学术追求并未松懈,自觉将论文再充实提高,其学术积极性只能够鼓励支持;二是,我深切感受到作者真情介入课题的研究姿态,学术理性的情感体验意识,很值得推荐给学术研究者的同仁,也希望给有兴趣的读者一种引导。

翻阅书稿,草草涂抹数句也谈不上最有发言权的读者,算是我与作者在南京师范大学这段难忘的师生情谊的回味吧,所以更多是肤浅的带有私情的认知。我坚信,书稿价值究竟如何最权威的评判应该是广大的无私的读者。

权为序。

杨洪承

农历乙未年初于金陵龙江小区外秦淮河畔

前 言

断代文学现象研究在建构宏观文学史的过程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种研究起到了类似计算机“C++”研究方式的作用，通过对于一个局部问题的妥善解决进而达到完善解决整体问题的目的。断代文学史研究的逻辑前提是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历史转折或断裂，这种转折和断裂提供了新的历史质素，因而具有某种烛照前后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抗日战争的断代历史特征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一方面因为作家的迁徙流转和生命体验的复杂变化而呈现出特殊的战时风貌，其创作主体心态、书写形态、传播方式和审美内涵都与抗战语境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这些深受五四自由精神熏陶的作者又从不同层面上超越了“战争当下”，往往达致对人类基本生存处境的思考与探寻，呈现出内涵丰富的独立自由思考精神。无论是就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连绵的战争背景和多变的政治格局来看，还是就新文学传统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巨大转折来说，这都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样本，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学史断代现象。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人们为散文创作结集作序的时候，研究工作业已开始。刘北汜为《曙前散文丛书》作的《前言》，就属此类。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多大型文集的编撰，诸多经历

过抗战的作家对于战时散文创作的回忆与评价，可以看作主题略显繁杂的研究，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历史始终未能够完整建构起来。

作为抗战文学研究的第一部系统文学史专著，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在整体上厘定了该时期的文学流脉，对于散文创作的关注却相对薄弱。这本出版于1947年的仅仅8万字左右的小书，虽然经朱德发重新修订出版于1984年，篇幅也扩展到了30万字左右，依旧保留了峻切的战争感受和强烈的民族情感，强调散文的“抗战时期”特征，而对“抗战时期”散文在独立自由精神阐发方面的超越性价值和意义重视不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大系》《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学大系》相继编辑出版，为深化研究抗战文学史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也侧面应和了“重写文学史”的诉求，不过抗战时期散文仍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对现代散文研究形成重要突破的成果，都在某种程度上对正确评判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价值产生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如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散文史》、范培松的《中国散文批评史》、姚春树的《中国现代杂文史纲》等。许志英、邹恬主编的《现代文学创作主潮》深化了对“第三个十年”整体文学创作的研究，但没有充分整合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对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也没有从“自由精神”的角度予以重点思考和论证。部分对自由主义作家的研究又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家的政治身份归属方面，对于抗战时期散文创作中蕴含的政治自由诉求之外的生命自由感受、学术自由呼吁、知识分子角色观念的反思与建构等内容，缺乏关注。

吴周文、王菊延发表于2000年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研究概观》不仅回顾了研究历史,更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问题:“散文研究中价值观念的重新确认与整合,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众多论著、论文对抗战时期散文作家、作家群的研究都体现了这种“重新确认与整合”的学术追求。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很能说明这一点,如黄科安《知识者的探求与言说——中国现代随笔研究》,对抗战时期的随笔创作列专节研究,并且从传播媒介、作家群聚集以及对鲁迅随笔思想和艺术的继承发展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蔡江珍《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以“中西之辩”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视界,同样是散文理论现代性构想的基本精神为论题展开的立足点,颇有启发人处。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位研究者的关注重点要么在散文文体方面,要么在散文理论方面,都不约而同地淡化了抗战时期散文,也许是因为抗战时期散文理论不够发达,而随笔文体又往往需要和“知识者”群体联系考察,导致抗战散文的多个侧面被置于其研究视野之外。江震龙《从纷繁多元到一元整一——中国解放区散文研究》,以解放区散文为研究对象,借用社会心理学角色概念与理论,阐释了何其芳散文创作的艺术命运,发现他的角色意识从美文的创造者、抒写自我者,经过展示苦难与批判现实者,转换成讴歌光明、赞颂将领、嘲讽敌人、自我贬损的文艺工作者。其立论重点在解放区文学环境对于作家的“生成性”意义,而不是创作主体与特定环境对话的独立精神,专注于特定区域散文创作的研究也不足以概括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版图内的散文风貌。无论是对现代散文史哪个阶段的研究,都离不开对该阶段散文观念和文体创造方面“价值观念的重新确认与整合”,抗战时期的政治区域隔离与审美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都使得在“整合”的前提下全面认识该时期散文创作成为一个极具挑战

性的学术命题，而这种挑战性反过来又有力地证明了该学术命题的价值。

陈剑晖《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散文的文体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5期），对于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文体特点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王继志《论现代文学散文的审美规范》（《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3期）、杨洪承《一个文学过渡期的“场效应”——20世纪40—60年代文学结构分析和生成思考》（《江海学刊》2005年2期）等论文，都能给人以方法论上的启示。

既然抗战时期散文作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对象具有足够的必要性，那么从何种理论视角切入就成为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就已经形成的研究成果看，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国散文，往往存在着忽视或弱化沦陷区散文的情况，这一方面使得对抗战时期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呈现出大体近似的表象，另一方面使“抗战时期”和“中国散文”这两大特征的内在关联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也没有使散文之反映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精神的文体特殊性得到充分显示，这也从侧面说明必须凭借新的理论视角才能形成突破。本论文所选择的“自由精神”视角，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考之上。

抗战激发的民族精神投射在作家的创作、思想活动和生活形态中，从现实政治、文化观念、文学表象等不同层面最初体现的是国民身份意识的强化，同时也使在战争延续过程中思考自我与民族、生存与意义的自由精神逐渐彰显。沦陷区作家虽然处于侵略者的强迫之下，但坚持用汉语写作和用曲笔书写人生的苦闷或忧思，不仅反映出对中国国民身份的坚守，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言说的自由精神。以自由精神视角考察抗战时期的中国散文创作，就有了一条主线把沦陷区散文合理地纳入现

代中国散文的研究视野之中，也使得抗战中期以后不同的散文创作流向有了一个合乎历史的逻辑前提。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统区所暴露的政治腐败以及沦陷区的民生疾苦逐渐成为散文创作关注的重点，又一次使散文拷问个体生命意义和思考人类生存普遍问题的功能显形，于是抗战时期的散文创作在弘扬民族精神之外，又一次焕发了其记录生命感悟、批判现实政治、审视人性弱点、想象宇宙场景的洒脱本色。这种富有知识分子角色意识的创作，不仅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现代性”，也体现了中国作家更为开放的现代“国民”意识，流露出强烈的独立自由精神。这种研究思路，是以往人们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散文时很少能够一贯坚持的，却是研究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与作家个体生命体验、与政治文化环境、与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历史语境之复杂关系的必要视角。

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散文创作的整体考察，本著将证明一个基本观点：即使在民族生存面临重大危机的时候，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放弃文学作为人之自由精神追求的重要形式，没有放弃对自我生命与存在的独立思考。同时，他们的不懈思考使西方自由精神传统——“我为什么必须服从另外一些人？”“我为什么不能如我所愿地生活？”“我必须服从吗？”“如果我不服从，我会被强制吗？又有谁来强制我，强制到什么程度？以什么名义？又为着什么目的进行强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生命自由的深沉追求逐渐融合，从而使“自由精神”在中国本土文明的土壤中发展出丰富的内涵。

鉴于这一目的，确定了本著的基本研究思路。

首先追溯现代散文自由精神的源头，然后对“抗战时期中国散文”进行界定，分析其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历史概念、一个政治概念和

一个文学阶段的多重意义；然后从国家民族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辩证关系，归纳分析散文作家自由精神发生乃至相互影响或沟通的文化逻辑。

接下来的主要工作，便是从不同角度对抗战时期散文创作的自由精神内涵进行辨析。

尽管人们对“自由”含义的理解有很多不同，但它一般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指政治方面的保障，一种指人之内心生活的某种状态”。也就是说广义上的自由应包括作为人的心理感受和国家政治法律层面的两种自由。随笔小品和杂文等分别对应这些内容，因此，本著确立了“政治自由的呼喊与凝思”“生命自由意志的沉潜与浮现”“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与辨析”三章。关于抗战时期散文对“政治自由的呼喊与凝思”，从“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激越呼声”“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热情召唤”“‘平等’愿望与‘集体自由’的对话”三个方面，细致探讨抗战时期中国散文言说政治自由的方式及其内涵。这一部分之所以选取政治自由视角，既是考虑到“抗战时期”和民族独立生存的内在关联，也是希望以这一章的论述为前提，进一步探讨在严酷的政治语境中人的生命感悟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政治自由是现代中国人集体性的显在诉求，又是获得个体生命自由和体现知识分子功能的前提。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生命自由意志的沉潜与浮现”，将深入抗战时期中国散文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探究其个体生命体验中折射的自由精神。分别就“在‘日常生活’中品味生命”“‘绝对个人主义’的自由书写”“与天地同呼吸的生命体验”等角度，深入分析抗战时期中国散文涵咏沉潜于个体生命自由的复杂形态及其意义和价值。这一部分思考的重点是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散文在咂摸个人生命温热、享受自我灵魂愉悦的同时，以自由精神对“人”之生命的滋养，或取乡土文学的嬗

变，或就“绝对个人主义”的扭曲，或取学者散文自由徜徉的“人与宇宙的对话”，予以条分缕析。这一章的立论前提是现代散文对于“人”的发现，人是自由的主体，自由是个体生命的本体之一。

至于“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同与辨析”一章，是在前述两部分论述的基础上，探讨创作主体的身份认同与自由精神的内在关系，故分别取“张扬文化批判的自由身姿”“‘慢慢求进步’的沉毅坚守”“学者散文透视人生的理性光彩”视角，重点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散文创作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内在关系。在本章中，所要重点思考的是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和他们的文学言说内容差别，强调这些不同的思考都以坚实的“工作”推动现代中国历史的进步。学者散文则以抒发自我的方式实践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些从不同方面强化了现代文学的社会文化建设功能的散文书写，反映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功能。对于抗战时期散文作者之知识分子身份有无的辨析，是对前两章的整合与提升。

分论之后，予以合论。“抗战时期中国散文自由精神的价值反思”，也就是对抗战时期中国散文自由精神的整体考察和总结。通过强调“抗战时期中国散文探求自由的本土化特征”和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中“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的冲撞交融”，合理参照并理智反思西方哲学话语中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概念区分，指出对自由精神的综合贯通，体现了抗战时期西方文化思想资源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传统的良好趋势，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努力完善中华文化再生功能的结果。同时还要认真梳理散文创作中所呈现的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相互对话交融的复杂态势，这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散文的重要审美特征。

最后，在宏观的文学发展史视阈中，思考“散文写作与知识分子自

由精神的微妙关系”，以达到对散文文体审美特质的深入认知。

总之，本书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散文创作的广泛深入考察，是要借助广泛的史实和丰富的作品来说明：虽然群体自由与个体自由常常处于冲突状态，但是抗战时期中国散文在为民族独立自由而呼喊、为个体灵魂自由而沉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器”身份而批判和反思这几个方面，出现了比较难得的和谐的态势，从本质上讲，这体现了以自由思想为核心的西方文化资源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良性发育。或者说抗战时期中国散文创作主体正是凭借着对自由的向往，才能在审视外部现实和咂摸自我灵魂的时候都能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言说，而以不同路向探询“自由”的散文作品，则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完善社会公共空间的努力，折射出知识分子自由地设计自我人生、构想历史进步的身份特征。